



乡村研究的情意识

中国是一个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大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0年，农村人口只能十分缓慢地转移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农村目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也将长期延续。

根据户籍统计，2000年中国乡村人口总数为9.28亿，城镇户籍人口数为2.28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3%。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8.07亿，占总人口的63.9%。第五次人口普查采用常住人口登记原则，因为很少城镇户籍人口到农村居住，而大量农村户籍人口到城镇务工经商，可以计算出约有1.21亿农村户籍人口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被统计为城镇人口。

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为城镇人口的1.21亿农村户籍人口中，有少数已经在城镇购买房产，安家立业，在城市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了，这部分农村户籍的人口应该计算为城镇人口。但大多数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户籍人口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是在城市讨生活而在农村过生活的一群人，他们年轻时到城市打工挣得养家糊口的生活费，他们在农村成家立业，在农村的家中养育父母和生育子女，在农村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离不开农村，他们不能算作城镇人口。如此计算下来，当前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村人口总数约为9亿。

9亿农村人口，等于西方七国集团人口总数的近1.5倍！

如果今后50年可以保持建国以来城市化的速度，则到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根据人口学家预计，2050年中国将有16亿人口，则农村人口约为8亿。

就是说，在未来50年，中国农村人口将长期维持在8亿~9亿的高位，期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行，而迅速将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

贺雪峰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 / 贺雪峰著.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9

ISBN 7 - 216 - 04070 - 8

- I. 乡…
- II. 贺…
- III. 农业政策 - 研究 - 中国
- IV. F3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283 号

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

贺雪峰 著

出版:
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安陆市鼎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数:317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4 000

定价:25.00 元

书号:ISBN 7 - 216 - 04070 - 8/F · 729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 / 1

制定政策、法律和制度，必须考虑 9 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存在、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过程和他们的从政策、法律和制度中得到的和失去的东西。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合法性不是自明的，不是来自西方话语及实践的逻辑讨论，而应来自 9 亿农民的实践本身，来自这些政策、法律和制度能否增进 9 亿农民的长远福利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伸缩自如的空间。

我们需要全面系统地从 9 亿农民的现实生存处境出发，全面检讨当前农村的政策、法律和制度。

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 ——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 17

当前农村人口的数量 / 19

如果我们按劳动力再生产的地域来划分城乡人口，就会发现，依托于农村生活并且只能算作是农村人口的人数不应该是“五普”公布的 8.07 亿，而应是 8.8 亿左右，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应为 70%，而不是“五普”公布的 63.91%，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不应是 36.09%，而只有约 30%。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了。

未来 50 年城镇就业吸纳能力 / 28

在未来 50 年，中国农村人口会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高位基数上运行。其实，这个高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1971 年中国农村人口已经突破 7 亿大关。农村人口不会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在未来几十年随着城市化而自然消失。

农民的福利及他们的生活状况 / 42

一方面，农民温饱问题大体已经解决，作为农民生存基础的最低的经济福利不成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从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乃至经济方面被置于边缘地位，农民相

对生存处境越来越糟糕。

再造农民的福利 / 57

农民福利的另一维标准是生活标准,即人们从生活中享受到的乐趣,这种乐趣脱离了衣食之忧,他们不仅希望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希望吃得好,穿得好,希望吃穿住以外,还有各种娱乐和社会交往,有心思体验人生的乐趣,可以思考文化的问题,关心超越自己生存的价值。

从文化方面重建农民的福利,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农民无事可做的富余时间变得有事可做,使生活有意义有价值,让富余时间消磨得足以构成农民的福利。同时,通过有意义的富余时间的消磨,让农民发现自己生存的本体价值,获得文化上的自足感。

乡村建设的展开 / 69

如果要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造农民福利的活动取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可以叫做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就是将乡村建设得山川秀美、鸟语花香、风景宜人,适宜于农民居住,让乡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充当稳定与发展的力量。就是要使乡村经济发展,生活殷实,信息发达,就是要将乡村建设成为人心宁静,人际和谐,幸福快乐的地方。

农民增收论的局限 / 80

不能从农业中,也不能从外出务工经商中使得农民收入出现的大幅度增长,期待农民收入大幅增长的想想法就不切实际,将不切实际的想想法用于制定政策,值得反思。

农村的希望在于乡村建设 / 82

在市场经济不可逆转,农民处境日渐边缘化的背景下,学术界及政策部门尽早介入乡村建设,探索农村希望之路,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以外部资源促内部发展 / 84

能否通过从外面输入经济的和智力的资源,来增加村民的自治意识,从而促成村庄的内源发展呢?

县乡村体制整体改革研究 / 88

乡村秩序与县乡村体制 / 88

当前学术界讨论县乡村体制改革的时候,习惯于从外部设计制度,抽象地将县乡村体制改革问题看作自上而下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甚至仅仅将县乡村体制改革看作向所谓“现代制度”变迁的一个步骤,满足于简单地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这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设计县乡村体制的研究,因为不考虑当前县乡村体制应该承担的实际功能,而不能为当前的县乡村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建议。

县乡村体制整体设计 / 105

全文分四节展开,第一节讨论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其地域上的非均衡性,以为县乡村体制的设计奠定现实基础;第二节讨论当前县乡村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节讨论目前学术界主要的针对性意见;第四节讨论县乡村体制整体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具体进路。

乡镇一级何去何从 / 140

乡镇建制必须保留;农业型乡镇:变乡政府为乡公所;工业型乡镇与中心镇:保留镇政府。

论乡镇消极行政 / 146

消极行政就是乡镇政府只办理上级交办下来的事情,不在上级交办的事情以外办事。上级对乡镇的考评,不是从乡镇额外完成工作的多少,而是完成上级交办任务的多少作出考评。乡镇行政退出诸如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建设小城镇等诸多方面的主导作用,主要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协调农村矛盾、实行计划生育、协助征收税费等等。具体地说,乡镇行政更多是充当“守夜人”,而不是作为创新者,更多实现保护的职能,而不是建设的职能。

乡镇体制的常规与内部结构 / 164

乡镇体制的深层结构,就是造成杨集选举现状背后的那些县乡默认的规则,理解这些规则,对于理解在县乡体制变动中发生的各种可能将大有好处。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不触动基本利益预

期原则(深层共识原则),最少不满意原则(最大共识原则),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制度整体性原则),选择权越小自主性越低原则(选择权与自主性相匹配原则),是造成杨集选举结果的五大规则。

农民负担、村级债务与乡村水利——湖北荆门农村调查 / 201

农民负担的现状与症结 / 201

当中央政府指望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按其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作为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却又没有足够财政能力为全国所有的地方经济投资的时候,中央除了对地方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保持事实上的默认以外,中央又有什么办法来获得以上两全其美的好事?

村级债务的成因与危害 / 221

化解村级债务火烧眉毛,不能再拖。

乡村水利的组织基础 / 241

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强调村一级不能再统筹共同生产费用,这个决定从税费改革方面看,尤其从当前农民负担的成因方面看,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由村民小组成立用水用电协会,由用水用电协会来讨论解决共同生产费的收取与使用,这个办法与当前农业水利的状况,与农民的组织能力等等是否适应,却大有疑问。

乡村水利的社会基础 / 257

小水利因为村庄性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决能力和解决方案,如何在意识到村庄类型不同的基础上来讨论乡村小水利,是当前讨论乡村水利中容易被忽视但不应该被忽视的问题。

乡村水利与农地制度创新 / 273

在村庄公共物品的提供中,能否通过各种办法将搭便车者边缘化,是这个体制是否有效的关键。边缘化的办法不仅可以是经济的,而且可以是文化的、社会的乃至政治性的。任何一种体制都是在特定社会政治结构中运行的。正是因为边缘化办法的多样性,使我们在考察提供村庄公共物品体制的效率时,不能仅仅将人

想作经济人,而且应该有更加整体多面的视野。

农田水利与农地效率 / 298

老田曾质疑说,中国农村劳动力在人民公社时期过剩就已经十分严重,当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时候,决定农地产量的因素就不应该是劳动投入的多少,而是其他决定农地效率要素的投入水平。

农村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303

论村庄政治社会现象 / 303

当前的村庄研究不能解释自上而下农村政策为何会在不同农村地区产生不同后果的原因,也不能说明不同农村地区村庄内生秩序能力不同的原因。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比较,以理解在制成不同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时,村庄自身因素是如何参与影响或决定了这些现象,并因此深入理解村庄的性质。

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 / 319

学术界常常说中国农村是非均衡的,但中国农村到底是如何地非均衡?政策部门常常说农村政策不能一刀切,那么农村政策到底应该如何切?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一个新的农村研究领域,这一研究领域要理解中国农村到底是如何的非均衡,中央农村政策到底在不同农村是如何实践及如何针对非均衡农村的事实来制定不是一刀切的农村政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正可以补当前中国农村研究以上两块和不足,并将以上两块中国农村研究联结起来。

村庄研究的若干层面 / 331

以上事实上区分出理解村庄的三个层面,其表层是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正是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构成了研究村庄的可以观察和测量的要素,从而将村庄研究变成了实证研究。构成理解村庄中间层面的是村庄社会资本量。值得注意的是,本处的村庄社会资本量是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构成理解村庄里层的是历史的维度。正是过去的历史,为研究农村政策在不同村庄的不同实践后果,提

供了基础。同时,正是在历史维度,可以发现市场经济是如何变动着影响中国村庄内生秩序的状况,并因此为将来改进 9 亿生产、生活和娱乐在村庄的农民的福利状况,埋下了伏笔。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 344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的关系。

农村政策实践后果的村庄原因 / 357

我们大多习惯于从外部评估农村政策的实践后果,尤其习惯于从农村政策好坏和县乡行政官员素质高低两个方面评估农村政策的实践后果。其实,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以外,农村政策实践后果即由农村政策制成的乡村政治社会现象更与村庄本身有关。

在不同类型村庄,同样的农村政策会制成相当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这些相当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并非杂乱无序地发生,而是有内在规律地发生。这种规律既表现在同一个具体农村政策会在同一类村庄产生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有规律发生的政治社会现象,也表现在不同的农村政策在同一类村庄实践后果的规律性关系。

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对象与步骤 / 373

问题是,即使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农村非均衡状况的影响,却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那些外观差异虽不明显却仍然重要的农村非均衡状况的影响,这些被政策部门视为当然的外观差异不大的农村非均衡状况,构成了当前农村政策实践差异的关键。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外观差异不大的农村,成为今日中国农村的主体,正是这些外观差异不是很大的农村构成了中央农村政策实践的主体,我们必须研究这部分农村的非均衡状况及这种非均衡状况对农村政策实践后果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的目标是理解 80% 中国农村的 80% 的现象。

后记 / 383

序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

一、9 亿农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中国是一个拥有 9 亿农村人口的大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50 年，农村人口只能十分缓慢地转移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农村目前“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也将长期延续。

根据户籍统计，2000 年中国乡村人口总数为 9.28 亿，城镇户口人数为 3.38 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73.3%。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8.07 亿，占总人口的 63.9%。第五次人口普查采用常住人口登记原则，因为很少城镇户籍人口到农村居住，而大量农村户籍人口到城镇务工经商，可以计算出约有 1.21 亿农村户籍人口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被统计为城镇人口。

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为城镇人口的 1.21 亿农村户籍人口中，有少数已经在城镇购买房产，安家立业，在城市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了，这部分农村户籍的人口应该计算为城镇人口。但大多数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户籍人口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是在城市讨生活而在农村过生活的一群人，他们年轻时到城市打工挣得养家糊口的生活费，他们在农村成家立业，在农村的家中养育父母和生育子女，在农村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些在城市讨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离不开农村，他们不能算作城镇人口。如此计算下来，当前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70%，农村人口总数约为 9 亿。

9 亿农村人口,等于西方七国集团人口总数的近 1.5 倍!

如果今后 50 年可以保持建国以来城市化的速度,则到 205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 50%。根据人口学家预计,2050 年中国将有 16 亿人口,则农村人口约为 8 亿。也就是说,在未来 50 年,中国农村人口将长期维持在 8 亿~9 亿的高位,期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行,而迅速将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不仅难以迅速转入城市,而且难以提高收入。当前乃至未来 50 年,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农业的收入,一是来自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因为农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农民生产的越多,亏得越大。由 9 亿农民为 4 亿市民生产农产品,必然落入生产越多亏得越大的陷阱。何况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比国内低,加入 WTO 后,农民来自农业方面的增收渠道就十分有限了。当农民不能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增加时,就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寻求增收的渠道。而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越多,有限的就业机会就越稀缺,务工经商的农民就越是不能在城市赚钱养家糊口,他们就越是需要依靠农村的农业兼业来维持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最近十多年来,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越来越难,务工报酬不断降低,劳动条件进一步恶化,就是证明。

换句话说,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将长期延续,因为务工经商收入不足以支持农民在城市完成家庭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会长期出现农民在农村兼业(以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在大宗农产品生产方面的农业劳动为典型)的情况,现代的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产业化农业没有空间。同时,农村人口将长期在高位运行,农民年轻时到城市务工经商而年老时回到农村度过时光,将成为一种典型生活方式。现代的以大量消费资源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在 9 亿农民面前晃来晃去,勾起农民消费的欲望,但农民并没有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以美好大词为基础的现代性理念也进入到农民的理念之中,但他们无法得到这些美好大词所承诺的结果: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

在农民生活长期维持“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同时，中国经济仍将高速增长，现代性的因素不仅会进入而且会渗透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高消费为代表的生活方式成为主导整个社会价值的主要标准（想一想以旅游和基础设施投入为典型的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制造着大批有闲阶层，他们大量消耗着本来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从而使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有闲阶层越来越愿意脱离于中国大众尤其是9亿农民，成为一个与西方现代性接轨的阶层，他们接受并主导着现代性的价值，他们成为中国大众包括9亿农民的人生目标，他们越来越主导着中国政策、法律、制度的标准。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9亿农民将长期陷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一方面成长起来的有闲阶层不仅要求与西方现代性话语接轨，成为现代性的体现者，而且为9亿农民制造以现代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

将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9亿农民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他们也是一群接受了现代性话语的现代人，是由市场经济塑造出来的消费者，是可以自由流动以实现自己劳动价值和人生价值的人。

9亿农民的出路问题构成了制约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不考虑9亿农民未来50年的出路，不考虑9亿农民在市场条件下再生产家庭和劳动力的条件，不考虑9亿农民自身的福利感受和评价，不考虑在9亿农民身上实施着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对农民福利的影响，不考虑影响9亿农民福利的政策、法律、制度背后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基础，中国现代化将会因为9亿农民没有出路而面临危险。

二、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制度必须适应中国9亿农民的基本国情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来自美国的价值标准越来越成为所谓国际标准，一些文人学者也开始习惯说“人权高于主权”，由此出现了制度移植的问题，自上而下、从外向内的农村政策、法律、制度没有经过细致论证，就被套用到了9亿农民的生活之中。当这些被套用到9亿农民生

活中的政策、法律、制度造成不良后果时,或者是另一些同样没有经过细致论证的政策、法律、制度被套用到9亿农民的生活之中。尽管当前农村实施着的政策、法律、制度到处存在着问题,却很少有人从这些政策、法律、制度与中国9亿农民生存状况是否相合方面进行反省,现代性的话语遮闭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总是开出与实际需要相反的药方来医治那些政策、法律、制度下乡造成的弊病,我们用现代性话语实现着当前农村有病的自我设定的预言。

按温铁军的说法,中国2.14亿户小农的生产剩余很少,在生产剩余很少的基础上,不能支撑现代制度运行所需要的高成本,移自西方的现代制度将不仅耗尽仍在农村起着作用的传统制度的效能,而且自己并没有维持下去的条件。按曹锦清的说法,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按徐勇的说法,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的强势,西方学术也成为强势话语。睁大眼睛向外看,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问题是在向外看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只能“学舌”,而不会说话了,即不能以我为本位吸纳、消化、转换外来话语,只是照抄照搬、生吞活剥。以这种眼光观察的世界只能是过滤了的想象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按照想象的世界所开的药方自然于世界的改造无济于事。这种思维方式也使学术界充满了忙于“抓药”而不会“看病”的人,因为西方话语中的“药方”取之不尽。即使“药方”不灵,也不是“药方”的问题,而是病人自身的问题。由此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理念与实际的关系。

因此,制定政策、法律和制度,必须考虑9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存在、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过程和他们从政策、法律和制度中得到的和失去的东西。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合法性不是自明的,不是来自西方话语及实践的逻辑讨论,而应来自9亿农民的实践本身,来自这些政策、法律和制度能否增进9亿农民的长远福利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

伸缩自如的空间。

检讨当前的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到处都是未经细究的富于意识形态的条文，其结果，在政治方面，如村民自治制度；经济方面，如当前村级债务的形成及拍卖四荒的行为；文化方面，如破除所谓“封建迷信”的做法；社会方面，如因为发生过械斗而禁止传统的龙舟比赛；法律方面，如鼓励上诉否定民间调解的趋向；医疗方面，合作医疗的解体和当前农民普遍看不起病的问题；教育方面，农民越来越读不起书，读书也越来越没有用处；娱乐方面，农民只能打麻将，几乎不再有什么有意义的娱乐活动；环境方面，农村的绿化越来越糟糕；卫生方面，农村公共卫生几乎没有；公共设施方面，农村内部几乎不再能生产公共设施；治安方面，地痞越来越多，农民的安全感越来越低。许多方面均出现了严重问题。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脱离了当前农村的实际，脱离了9亿农民将长期“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实际。

反过来，如果我们从9亿农民将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阶段，9亿农民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的理念和由广告、时尚所刺激起来的欲望，却没有实现这些欲望的手段，9亿农民将在相当漫长的阶段并无可以城市化的出路等方面来检讨反思当前的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的农村政策缺乏基本的一贯性和统一性，我们一方面在系统地改变农民生活数千年的村庄，改变农民数千年村庄生活所形成的传统的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机制，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为农民提供进入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要将农民迁出村庄，却不能在城市为农民留下居住空间。我们鼓励农民消费，吊起他们消费的欲望，却不能给农民足够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来满足自己的消费品味。电视上每时每刻都演绎着现代的小资调情和传递着小资们的文化品味，却不能给农民基本的文化生活的满足，甚至农民自己在强大的消费主义电视文化的教育之下，对自身生活感受的不满足程度也正在迅速提高之中。在9亿农民还无法完全走出村庄，村庄生活仍然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时候，我们却在系统地削弱村庄的功能；我们一方面没有

能力为村庄生活的农民提供现代的生活,一方面却在系统地改变着农民现在的生活;我们用现代的理念以足够的理论论证农民现在的生活是落后的、不对的生活,却不能为农民提供应该的现代生活的基础条件;我们以现代的理由指责农民的生活,却不能以现代的理由建设农民的生活。

这就是目前自上而下在 9 亿农民中实践着的政策、法律、制度的根本性弊病所在。

站在 9 亿农民的出路和他们生产生活感受的角度来考虑当前的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将得出与被现代性裹挟着的大词所考察的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中国农民人数很少,如果中国农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经历痛苦的转型即能够进入现代性所描画出的生活之中,我们也可以忽视农民自身的生存处境和他们对这一生存处境的感受。但是,中国 9 亿农民长达 50 年没有出路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的问题,使我们必须谨慎对待随着全球化时代而来的现代性的霸权,防止强势话语未经检讨即合法主导当前在 9 亿农民中实施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

我们需要全面系统地 从 9 亿农民的现实生存处境出发,来全面反思当前农村的政策、法律和制度。

三、外来理论必须经过全面检讨,要分学科反省当前的农村研究

当前分学科进入的农村研究因为受到学科视野的局限,而在农村研究中说了很多不知所云的话,发表了很多不知所指的文章。在充斥着大词的农村研究中,很少有人反省有着西方意识形态背景的大词在当下中国的含义,不断地有人说着“为了公正,即使天塌下来”的大话。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延续,不能让天塌下来。因为天塌下来就没有了希望。

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在西方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种社会科学具有为西方当下历史处境进行合理性论证的一面。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着的 19 世纪,这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在于

论证西方社会演进发展的规律，而由于 19 世纪的西方不仅在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而且西方通过军事政治强势从全世界掠夺资源以加强自己经济上的乃至政治军事上的强势地位，在这种历史处境中发展起来的西方强势社会科学，具有马克思所指斥的“庸俗经济学”的一面，而且正是马克思所指斥的庸俗经济学发展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帝国主义。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今天正在未经批判地全面渗透到中国的当下处境之中，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容质疑的意识形态教条。今天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一如建国前，充斥着诸多荒谬的教条。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又是近代以来屡次被西方文明用军事打败的弱国，富国强兵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强有力的声音和吁求，为了让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作出了整个世界绝无仅有的几乎所有方面的改革和革命。由洋务时期的富国强兵运动，到戊戌变法的政体改良尝试，到辛亥革命的国体革命，到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到建国以后的社会革命，乃至到改革开放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凡是可以试验的方案，在短短一百多年历史中，中华民族都已试过，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守旧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行不通后，全盘西化竟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最强音！然而，“老师总是打学生”，在强势帝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下面，中国不能完成自己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革命。只是到 1949 年之后，依托中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在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下，中国才真正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华民族终于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机，中华民族终于可以喘上一口气了。

但是，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显然不能解释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大国的工业化过程，因为中国是在西方强势帝国的围堵中，主要凭借自身力量来完成自己的工业化积累，建成自己的现代经济体系的。中国独特的工业化进程，并非如西方那样是以私人资本主导完成的，这需要有中国的社会科学来解释，但是，今天的西方社会科学凭借着西方依然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强势，被无

批判地引入到今天的中国中来,中国英雄主义时代的历史,被这些为西方强势国家辩护的西方社会科学所歪曲,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本来是一部探寻发展出路,并求得了发展出路的历史,却被未被批判地引入的西方社会科学解释为一部荒诞的历史,一部到处是错误,全部要否定的历史。

目前,从西方无批判地引入的社会科学,既不能解释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探求出路的历史,也无助于理解当下中国人民所处的境况,还无法为中国人民未来的发展指出路向。因为未被批判地引入到中国的西方社会科学,脱离了它产生的基础。这种未被批判地引入到中国的西方社会科学因为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优势,而被一些中国的本本主义学者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神话,成为意识形态标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到处充斥着无知的神话,一些脱离语境的大词到处炫耀着自己,从而让那些本本主义学者得到职业利益,这些得到职业利益的本本主义学者到处说着不知所云、不知所指的大词,他们总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无所指的,是从西方照搬照套过来的。但这些无所指的本本主义学者却用那些在西方语境中无错的大词和好词,到处指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到处为中国的未来设计出路,他们将本来有所指的西方社会科学变成意识形态来套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否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这些本本主义学者在现实中间当然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不能照搬一个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内外部条件给当下的中国,因此无法合理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当下的处境和为中国未来找到出路。但这些本本主义学者又成功了,因为他们一直到今天都正在获得着丰厚的职业利益,他们还正在误导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必须从中国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立场,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大国的历史,从中国9亿农民没有出路的现实出发,去把握与借鉴具有独特历史条件的西方社会科学。我们必须知道引进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当下语境中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理解引进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必须放下意识形态的武器,将来自西方的标准全